

殖民体验与都市书写 ——以鲁迅上海十年的创作为中心

丁颖

(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 辽宁大连, 116600)

摘要: 在关于殖民都市上海的镜像描写中,现代作家鲁迅的体验和书写无疑具有标本式的意义。展开对鲁迅及殖民都市上海的关系研究,不仅可以观照一种崭新的极富创造性的城市文本,丰富物理意义的上海的内涵,更重要的是,能通过鲁迅对上海殖民时代众生形态的刻画,接触到一个别样的殖民都市上海,感受到一位“波西米亚”气质的“浪子文人”复杂而浩渺的伟大心魄。

关键词: 鲁迅; 上海; 殖民体验; 都市书写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3-0391-04

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 R·E·帕克曾经这样写道:“城市是人性的产物”^{[1](43)}而且“城市改造人性”,“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所培养的各种新型人格”^{[1](265)}。同样,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中,人与城市、城市景观与文学及城市文化显然已构成了一种共生性的互文关系。城市一方面以空间性的范围和形式演绎着历史推演的过程,催生一种对应性的城市文本的出现;另一方面则以文化的形态诠释着城市本身的性格,叠加书写者自身的情感方式、生活形态和价值取向,完成一种规定与被规定、想象与被想象的言说。

正如外族的入侵以及中国现代性的被动嵌入一样,伴随着压抑感沉重的殖民屈辱,上海这个城市自1845年英租界的正式辟设,到1945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在百年光景中,以开放性的姿态,承受着殖民统治的同时,也接受着具有浓烈的殖民色彩的现代文明的洗礼,并逐渐攀升为国内最为繁华、最具现代意味的国际性城市。正如研究者的评价:“近百年的上海,乃是城外的历史,而不是城内的历史,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繁华喧嚣且兼容并包的十里洋场上海,自然会对现代作家鲁迅及其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白话小说的写作成为“老调子已经弹完”,描摹日常生活的杂文创作作为最主要的叙事方式,《故事新编》在不同时期的“断裂性”特征

的文本表现,自然不是一个偶然性的现象,直接而深刻的殖民体验不断诱发着书写者对上海这一文化资源的探索 and 解读,而且在深化其多样繁复的都市书写与批判的同时,也在文本层面上诠释并丰富着上海的内涵。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鲁迅与上海的遭遇无疑具有标本式的意义。

一、殖民都市语境

吴福辉认为,近现代上海的文化是一种“洋泾浜都市文化”……“洋泾浜一词在上海方言里涵义丰富,指一切不中不西,既新又旧,非驴非马的人或事,从来是贬义的代名词。”^[3]一方面上海因日益膨胀的繁荣和欧化,一跃成为古老沉寂的中国土地上的“新神话”,梦一般地将物质的富足和繁华呈现在世人面前;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化的“孤岛”城市,“一个作为中国现代性文化母体的城市”(李欧梵语),上海的城市管理权从中国整体行政体制中逸出,强迫性地接受近代城市模式,成为古今、中外、新旧文化交叠扭曲的产品,从而成为“目睹现代性普遍的核心困境的最佳地点”。^[4]

鲁迅面对着的正是这样一个上海。1927年9月27日,鲁迅携许广平来到上海,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共和旅馆”即在租界范围之内,此后十年

收稿日期: 2007-11-13

作者简介: 丁颖(1975-),女,辽宁大连人,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鲁迅研究。

间先后有过三个寓所,即景云里23号、拉摩斯公寓和大陆新村9号,均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租界化区域,包括后来避难之所也均是租界和半租界,所以有《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编、末编等“半租界”之作。屡遭革命之梦放逐的鲁迅,最终选择上海作为壕战之所,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描写,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有着“时代的眉目”,“反映中国大众的靈魂”,而且“实质上潜入了现代都市生活的靈魂,把握了这个事件和物象所构成的世界的矛盾和张力,表现了现代生活不连续性和断裂的特点”。^[5]鲁迅对上海殖民时代的描写和批判,不仅有其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立场与出发点,而且也适时地顺应了上海城市化的进程,完成了对政府的工业化政策与西方市场经济片面移植而成就的畸形繁荣的凝视和反思。鲁迅的后期杂文是“对以上海为中心的30年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商业社会的透视和批判。”^[6]早在世纪之初,鲁迅就做了犀利的判断:“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坟·文化偏至论》)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这种“侍主性文化”一方面促使反动政府进行愚民统治,培养新的奴隶,孕育和制造“无声的中国”,另一方面则迎合殖民主义统治中国的需要,发挥其强大的同化力,在西方文化输入及城市工业化、现代化、商业化的同时,非但没有摆脱传统文化的压制,反而增添了新的奴役,恶性嫁接和发展了更为残酷、更为厉害的压迫方式。为此,鲁迅在《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中激愤陈言:“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7]鲁迅这样深刻地分析在殖民主义政治背景下中国民众的生存形态,揶揄并抨击了帮助排宴席,做“醉虾”帮手的少数分子行径的可耻和卑劣,尤其对那些实为洋奴却自鸣得意的西崽及其“西崽相”更是深恶痛绝:“倚徒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却又为实际上所

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

^[8]在鲁迅看来,这种“西崽相”即是古已有之的因事大而自大,是中国奴性传统的现代延伸。为此,在鲁迅后期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里冷冷地说道。”(《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时候是二十世纪,地方是上海。”(《准风月谈·抄靶子》)“现在是二十世纪过了三十三年,地方是上海的租界上。”(《准风月谈·序的解放》)这种异质同构的文化形态并没有混淆鲁迅透彻冷峻的思维,相反更因此而弄敏了感觉,在双重奴抑、屈辱和多重殖民忧虑之下,由透视纷繁复杂的事象,对自身和民众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冷峭的表现,把握都市繁华背景下深层畸形的民族根性及其汰变,理性反思上海的殖民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

二、传媒职场与弄堂叙事

“现代性经验不再仅仅是某种政治运动的兴起,也不再仅仅是一些知识分子从事的启蒙事业,而是一个极为纷杂的过程。对现代性的寻求不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毋宁是一个被迫的生活过程。这是一个充满了吊诡、矛盾、腐朽和生机的过程:它不仅创造了一个东亚地区最为繁华的都市,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日常生活经验,一种新的文化认同,一种不同的生活态度。”^[9]上海之于鲁迅无疑有着相似的意味。面对着租界文化的特殊语境,加之对文化市场的仰赖,上海时期的鲁迅无论是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在创作形式上均作出适当且适时的调整。1927年鲁迅曾在香港做了一篇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上海这个传媒业发达、文化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的都市,一方面给予作家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也以其自身的运行机制规定甚至限定了作家的创作模式和叙事方式。心思敏感的鲁迅自然也会针对性地考量这种环境的改变与个人文运的关系。事实上的确如此,租界上海不会为他提供北京时期雍容稳定的生活,更没有了厦门木板楼上独对的“黑絮一般的夜色”。相对应地,租界上海是一个靠报刊、传媒一统天下且包罗万象的信息社会,赋予久住北京的鲁迅的是一个相对陌生化的文化语境。作为一个鱼龙混杂的城市,租界上海物欲横流,人声沸腾,各式各样声音泛滥,“只要

上海市民存在一日，嚷嚷声大约是不会停止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弄堂生意古今谈》)。因而他给台静农的信中说道：“我在上海……心也静不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及了。”(《鲁迅全集·280224 致台静农》)另一方面，他极其厌倦北京时期学院生活的“寂寞”与“平安”，甚至认为，“我宁可向泼辣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此样活气的文人打棚。”最终还是选择上海作为自己思考和奋争之地。这种“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10]不适又难弃的殖民都市体验，这种视觉和听觉所及之处的琐碎而平庸，则是他作为职业作家所要适应的场域，因而，鲁迅放弃了一贯成功的回忆叙事，潜入到租界上海的日常生活，在殖民体验与民族意识的纠结中，更多地选择篇幅短小、直观现实的杂文作为战斗的武器，放弃了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走向了与普通市民喜好更为合拍的日常叙事。正如刘纳鸥、穆时英以“舞场”“咖啡馆”作为上海叙事的基本角度一样，弄堂则是鲁迅关注上海、想象上海的基点。作为平凡市民庸常逼仄的生存状态的缩影，弄堂视角的选择，不仅有利于鲁迅对上海镜像的具体书写，而且可以明显接近普通市民的生活，展开对常态生活的近距离描写，避免对上海浮光掠影般的模糊性描述。张爱玲喜欢听“市声”，欣赏和倾心的是上海生活的日常性和世俗性。鲁迅虽对这种都市生活没有太多的好感，但多年的租界生活毕竟练就了他的感觉，文字间自然流淌的是一个租界弄堂人的日常体验和好恶。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弄堂生意古今谈》中就对一阐北弄堂人向洋人叫卖零食的声音进行描写：“Ringo, Banana, Appulu-u, Appulu-u-ul!”“Hana 呀 Hana-a-a! Ha-a-na-a-a!”声音隐含着城市所有的秘密，弄堂集散着混乱、无序、无层次的声音，也昭示着熙熙攘攘的上海特有的生气。在上海时期，鲁迅以阿金为题，写了一篇小说式的杂文《阿金》。作者对阿金极尽厌恶却又无可奈何，既鄙视她的混乱和俗气，又赞叹阿金的气度和灵活。阿金绝不仅仅是一个为洋人帮佣的女仆，更是一个以功利为准则、施展浑身解数讨生活的上海人。阿金身上不仅体现了上海扰攘实利的都市气氛，也真切刻镂了半殖民地都市造就了怎样的城市品格。这正是鲁迅三十年代置身都市上海对洋场世相、弄堂生活长期观察的结果。“城市生活的一个极大特征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互相见面又互相混杂在一起，但却从未互相了解”，“个人的流动(mobilization of individual man)”，使得人们相互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但却又使得这种

接触变得更短促，更肤浅”，^{[11][42]}都市上海人口的高密度分布使得人均占有的物理空间空前狭小，弄堂的拥挤逼仄正是这种生存状态的表征。物理距离的密切并没有带来邻里间亲密和频繁的接触，相反却以衣冠和服饰作为品评经济地位的标准和待人接物的砝码，为此鲁迅也发出了同样的唏嘘慨叹：“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11]此外，红头阿三、吃白相饭的、上海的小瘪三、弄堂早熟的少女、“懂洋话，近洋人”的西崽等等均是出入这种弄堂之间的主角，他们畸情而实在，圆通灵活而无矫饰，令人嫌恶而又无可奈何，不仅完成了鲁迅对上海殖民时代众生形态的刻画，而且在毁誉并交的心理体验中，成就鲁迅眼中和笔下的别样的殖民都市上海。

三、永远飘泊与寻找

北京时期的鲁迅做教育部的文化官员，在几所高校兼着教职，生活较为安稳固定，鲁迅长期居住的绍兴会馆也极为暗合侨寓文人居住在这“极富乡村气象式的城市”做着多样的怀乡梦。这些均影响着鲁迅独对自己的心灵，以回忆的笔触，围绕以鲁镇为代表的中国宗法制农村社会进行文化上的启蒙和反思。置身于“东方的巴黎”上海之后，鲁迅便正式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并承担一个城市市民为谋生所要面对的琐碎和艰辛。在后期的杂文中，鲁迅十分坦率地谈论其卖稿易钱的生活。细读《鲁迅日记》后会发现通篇较少对精神生活的描写，对家事和国事也不多加记载，但对每一笔收入和重要的开、支均有详细的记录。对书报检查制度带给作家写作上的影响也有文字上的表述：“这是一种新政策，我会受经济上的压迫也说不定。”对出版界的诋骗和萧条也有抱怨：“上海已冷，市场甚萧条，书籍销路减少，出版者也更加凶起来，卖文者几乎不能生活。我日下还可敷衍，不过不久恐怕总要受到影响。”早在二十年代早期，鲁迅就对钱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12]对经济权的重视使鲁迅在处理日常物质生活时有着职业作家在职业上的自由性和人格上的独立性，同时也意味着鲁迅已经实现了一个职业作家职业化、市民化的过程，承认生命个体物质欲望的合理性，也懂得与出版商和书局交涉，为稿酬和版税而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李书磊曾经做了如此的评价：“鲁迅已从精神上获得了现代城市市民的身份证，

身处在一个市民的环境,经历着一个市民的悲欢,鲁迅渐渐地向他作为一个历史过渡时期代表人物的人格转变。”^[13]

然而,鲁迅并没有完全自适于上海时期相对优裕的生活,卖稿生涯也没有使鲁迅的生活衍变为世俗意义的市民化,扑面而来、无孔不入的商业化、经济化热潮非但没有遮掩其澄明、深邃的目光,相反却使他在租界声光电色的畸形繁荣中,剥离其浮泛的表层,激发其追根溯源的想象力。正如当年京、海派论战正酣之时,鲁迅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犀利深刻的判断指出二者的分歧之处不过是“官的帮闲”和“商的帮忙”,不无讽刺、预见性地暗示他们有“合流”的症候。既不认同京派的绅士气派和“死样活气”,也不欣赏海派文人“才子加流氓”的市俗与摩登。以中立的态度,自觉地边缘于京、海派之外,成了传统士大夫文化与洋场租界文化之间的中间物,永远的“在而不属于”。正像赵园所说的,“鲁迅既不是乡土的,也不是都市的”。而这种“绝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的人生姿态恰似本雅明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描述的“波西米亚人”——“每个属于波希米亚人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并或多或少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从文学的极限和反抗俗世和庸众的角度来看,鲁迅无疑也是一个拥有“波西米亚”气质的“浪子文人”,其精神特征与“彷徨于无地”的“影子”,惟知前路是“坟”犹“反抗绝望”的过客是相近的,在无限展开的现实中,在对个体精神存在和民族悲苦命运的深刻体验和文化反思中,遭遇纠缠着当下的以往的幽灵,永远将人的独立和解放作为立论的前提和准则。永远在人类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发现和批驳当中保持一个清醒而鏖战的战士姿态,剥离斑驳难辨、涂饰很厚的浮世绘象,永久地抓住前现代社会出现过的本质,使虚伪和丑恶汗颜、溃灭,将真象公之于世,让真理澄彻。

鲁迅的一生“走异路,逃异地,”“携妇将雏”,遍看“城头变换”,经过了数次风雨颠簸。“仅从鲁迅最后十年的杂文所取的材料,形式和风格的演变来看,斗争的情势,上海时期显然要比北京、厦门和广州时期更为严峻和急迫。”^[14]在政局动荡、国难当头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他要承担职业作家在“魔幻之都”谋生的艰难和繁琐,在接受上海对其城市化过程的同时,另一方面则始终保持着清醒和警觉,始终秉承着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贯坚持的生存意志、文化心态和民族情怀。因此,鲁迅特地选择“横站”的姿态来面对精神文化界,面对纷纭复杂、险象环生的殖民

都市上海,以“一个也不宽恕”的绝决否定虚饰后的种种假象,对普通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不同形式的奴化和奴从深恶痛绝,追求“彻底走出‘人的奴隶时代’,扫除对人的一切形式的奴役、压迫,还人以原属于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15]。即使在“势利之区”上海,即使在病中,鲁迅尤能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将生命的最后十年留给了上海,上海成为他审视文化、审视人性最易触及、最为切近的窗口,鲁迅也将自己成熟而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夹杂在有关上海的镜像描写中,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极富创造性的城市文本,增加了上海描写的风骨和质感,使斑驳难辨物理意义的上海具有了延展的意义。鲁迅思想的维度也因三十年代的海派而更富有锋芒,更富有痛击丑恶现实的韧性和力量,并随同乡土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完成一名现代知识分子过渡与转型的“同构”过程。“人与城”,鲁迅与上海之间,无疑具有一种举足轻重的关系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R·E·帕克, E·N·伯吉斯. 城市社会学[M]. 宋俊岭,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2] 曹聚仁. 上海春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9.
- [3] 吴福辉. 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J]. 文学评论, 1994, (1): 5-17.
- [4] 张旭东. 上海的意象: 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J]. 文学评论, 2002, (5): 90-102.
- [5] 旷新年. 1928年革命文学[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184-185.
- [6] 钱理群, 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37.
- [7] 鲁迅. 鲁迅全集·二心集·民族文学的命运[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11.
- [8] 鲁迅. 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一至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55.
- [9] 汪辉. 〈上海: 城市、社会与文化〉序[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482-483.
- [10] 鲁迅. 鲁迅全集·书信·331202致郑振铎[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84.
- [11] 鲁迅. 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少女[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63.
- [12] 鲁迅. 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60-161.
- [13] 李书磊. 都市的迁徙[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 52.
- [14] 林贤治. 鲁迅的最后十年·引言[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7.
- [15] 钱理群. 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C]//一土. 21世纪: 鲁迅与我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353.

Colonial experience and metropolitan writing ——On Lu Xun's ten years creating in Shanghai

DING Ying

(College of Chinese and Law,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116600, China)

Abstract: There was no doubt that Luxun's experience and writing was a sample about description of colonial city Shanghai. The author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xun and colonial city Shanghai. Her study not only sensed a new creative city, but also obtained a distinctive colonial Shanghai through Luxun's pens, keeping up with a complex and immensely great heart of a "Tramps" author with "Bohemia" qualities by Luxun's portray about all the shapes of Shanghai in its colonial period.

Key words: Lu Xun; Shanghai; colonial experience; metropolitan writing

[编辑：苏慧]